

解放战争时期的邓小平和陈云

张金才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和陈云虽然不在一起共事,但却是他们革命历程中共同点较多的时期。他们都处在军事斗争第一线,这是邓小平和陈云少有的同时从事军事工作的时期。他们都在地方工作,邓小平从晋冀鲁豫中央局转战到中原局,后又到西南局并主政西南,而陈云除解放战争时期之外,其他时期基本在中央高层工作。这一时期他们都在党的建设、土地改革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可见,这是邓小平和陈云少有的都在地方工作的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千里跃进大别山,陈云主动请缨去南满,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二人都表现出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的革命精神,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 邓小平;陈云;解放战争时期

〔中图分类号〕 A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921(2018)04-0100-10

DOI:10.16870/j.cnki.51-1763.2018.04.014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和陈云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一直处在战略全局的关键位置,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这期间,邓小平和陈云虽然不在一起共事,但却是他们革命历程中共同点较多的时期。

一、他们都处在军事斗争第一线,这是邓小平和陈云少有的同时从事军事工作的时期

邓小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部分时间都是带兵打仗,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处在军事斗争第一线。陈云自称不懂军事,解放战争时期是他革命历程中一个很不平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陈

〔收稿日期〕 2018-05-20

〔作者简介〕 张金才(1968),男,山东德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史研究室副主任,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邓小平和陈云思想生平研究。

云一直处在军事斗争第一线，参与了领导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成为与邓小平同时从事军事工作的少有的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不断挑起局部战争。由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横亘中原，堵住国民党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的通道，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因此，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矛头首先指向这个地区。1945年9月，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全歼侵入解放区腹地的国民党军队，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接着移师东进，阻击沿平汉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刘邓又取得了邯郸战役的胜利。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停战协定的达成起到重要作用。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陇海铁路南北开展运动战，大踏步进退，连续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等较大规模的战役，取得八战八捷的胜利，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打出了刘邓大军的赫赫威名。

1947年6月，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的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部署，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强渡黄河天险，在鲁西南地区经过28天连续作战，歼敌5.6万余人，打开了南下的通路。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在几十万敌军的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地区后，对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形成了直接威胁，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地区的敌军增加到约20万人，斗争极端艰苦。刘邓领导大别山根据地军民积极、灵活地打击敌人，不断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地区轮番的重兵“进剿”。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与相继南下的另外两支野战大军在中原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牵制和吸引了敌军南线160多个旅中90个旅的兵力，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阵地。从1948年春起，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相继发起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摧毁了中原地区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淮海战役中，蒋介石先后集结近80万军队，而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只有60万人，在武器装备上国民党军队更是占有巨大的优势。总前委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经过66天的作战，共歼敌55.5万人，取得淮海战役的完全胜利。1949年4月21日，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

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率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京沪杭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浩浩荡荡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进军大西南，迅速消灭了盘踞在云、贵、川三省的90多万国民党反动武装，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最终被逐出中国大陆。在西南期间，邓小平参与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邓小平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

邓小平在解放战争中转战南北的时候，陈云正战斗在东北战场上。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陈云到达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1月初，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后又兼任北满军区政委。11月底，他在起草给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是把武装力量及干部分散到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广大的巩固的根据地。这个正确主张，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陈云花费大量时间在宾县、通河、方正、木兰等地进行调查研究，领导创建北满根据地。1946年6月，他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7月，陈云为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经东北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并得

到中共中央批准。这一决议按照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思想，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关键的工作方针；对敌作战则应遵守不重于城市和要地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原则，从而进一步统一了东北党政军的思想，使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大踏步前进。

1946年10月，在国民党对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调集重兵进攻南满解放区的危难时刻，陈云出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提出坚持南满斗争的正确战略主张。在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下江南”的配合下，他同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等指挥南满部队“四保临江”，这一胜利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又指挥南满部队参加对国民党军队的夏季攻势，同时领导辽东地区的土地改革，使南满解放区得到恢复和扩大。1948年1月，陈云回到哈尔滨，继续参加东北局的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后又参加组织指挥辽沈战役。陈云在建立东北根据地和东北解放战争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二、他们都在地方工作，这是邓小平和陈云少有的同时在地方工作的时期

邓小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了从1927年7月到1929年8月在党中央机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两年，以

及在长征途中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6月第二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之外，其余时期绝大部分是在地方工作。他先是在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后到江西瑞金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战斗在太行山区，创建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后主持北方局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从晋冀鲁豫中央局转战到中原局，后又到西南局并主政西南，也都是在地方工作。而陈云除解放战争时期之外，其余时期绝大部分是在中央高层工作。因此，解放战争时期成为邓小平和陈云少有的同时在地方工作的时期。

1945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1947年5月，他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1948年5月，他继续担任辖区扩大后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及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在开辟中原新解放区的过程中，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从中原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整党、土改等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

1948年1月22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大别山可分为巩固区和游击区两种区域。在巩固区应实行充分的贫农路线，满足贫农的土改要求。为达到此点，富农的粮食、耕牛、农具、土地、埋藏现金，必须拿出分配。对弱小地主的衣物、家具在分配时，留出自用的部分。对中农一般采取不动的政策为好，不是强制地打乱平

分，使中农不满。在游击区一时期内还谈不上平分土地。^{〔1〕}

同年2月8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再次提出新区土改工作应分阶段分地区地逐步深入。他在电报中指出，为了避免“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在新区树立两个观念非常必要。（一）根据地之确立与土改之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半载所能达到。（二）在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地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实与农民有利。”邓小平结合大别山地区土改工作的经验教训，就对待地主、富农、中农的政策和发挥贫雇农的领导骨干作用问题，提出全面意见：“（一）中农打乱平分应绝对采取自愿原则，不要勉强。（二）现在的贫农团已经保证了贫农在农村的领导骨干作用，即应迅速扩大为农民协会，吸收中农入会和个别中农积极分子加入领导机关。在尚无工作的此类新区，亦可不先组织贫农团，而先组织农民协会，但必须保证贫农的领导。（三）暂时不斗富农底财。（四）使地主，特别是小地主能够生活，不要一扫而光。”这些意见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他在转发邓小平电报的批语中说：“（一）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二）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2〕}

经过对新区土改工作的深入调查，邓小平认识到，在新区不管是巩固区还是游击区，马上动手分浮财、分土地是不适宜的，当前新区党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发动群众支援革命战争上面。1948年5月9日，

他致电毛泽东提出：准备将当前的工作重点“放在财经工作方面”，保证“粮食供应的主要地位”，“大量举办工农商业”，“利用私人工商业来稳定物价”，并“组织公家的经济”等；而“将土改工作推至今冬明春”，“择重点创造典型，积累经验，训练干部”，进一步做好准备工作。^[3]

邓小平的意见对毛泽东决定调整新区政策，变土地改革为减租减息起到了重要作用。5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解放区土改政策的重大调整。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邓小平于6月6日为中原局起草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鉴于我们以往在新区所犯的急性病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全区都应根据5月25日中央关于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重新地全盘考虑我们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4]该《指示》对中原解放区一年来土改工作中的错误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指出：“为了不重复错误，有效地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更早地完成全部解放中原人民的任务，全区应立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等等现象。”^[5]《指示》还根据中原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下一步进行土改的具体工作方针和政策、策略。其中，将原划分的“巩固

区”和“游击区”两种区域，改为“控制区”、“游击区”和“崭新区”三种区域，并分别明确了三种不同区域的不同政策和策略，以更好地进行分类指导。《指示》上报中共中央后，毛泽东于6月28日代中共中央复电，完全同意中原局这个指示，并将这个文件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各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5月25日指示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整党方面，邓小平1948年2月9日致电毛泽东，提出整党宜首先着重于查纪律、思想作风和工作，不宜首先着重于查阶级成分。电报说：近来各地展开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运动极端重要。如做得好，可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但愈操之过急也很危险。最近看到邯郸军区政治部对部队情况的通报中，似对干部出身一点强调过分。整党的目的是把坏人清洗出去，把内部怀疑的人放置不重要岗位，继续审查。对于一切地富出身但愿改造的人，应采取争取和教育的态度。因此，整党的方法应首先着重于查纪律、查思想作风、查工作，不宜首先着重于查阶级成分。在地方，无论由部队或地方派出的干部，问题均多，亦采取先查思想作风，着重反省的方法，规定过去既往不咎，今后严格注意。同时我觉得党内过去在审干时伤害知识分子党员已经不轻，此次整党确应慎重。^[6]这一重要意见也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对防止和纠正整党工作中“左”的偏向发挥了积极作用。

陈云在东北工作期间，也对党的建设、土地改革等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

在党的建设方面，陈云针对辽东地区党组织内部存在的分歧，提出三条原则性意见：（一）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这是应有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否则，就会助长混乱，不能解决问题。被责备者不要一触即跳。“大广播”比“小广播”好，正面讲比背后讲好。是否是事实，一见面就清楚了。（二）党内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民主不仅一般需要，在目前情况下有特殊需要。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核心领导只有经过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并在实践中经过考验，才能建立起来。民主又必须集中。个人意见不被采纳，不能生气，也不能不尊重集中的决定。（三）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遇到不如意的事和人，就不干工作，或在言论行动上消极，这是不对的。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是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在我们党内，个别党员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7] 这些重要意见虽然是针对辽东党内存在的

分歧提出的，但对健全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在土地改革方面，陈云强调要走群众路线，把土地改革全部政策的出发点放在农民彻底翻身这一点上。1947年6月6日，他在南满分局和辽宁省委召开的直属机关千人干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四点要求：第一，彻底摧垮地主阶级的封建堡垒。第二，培养群众所拥护的真正积极分子。第三，走群众路线。无论发动斗争还是分地，领导都不要包办代替，要让农民通过诉苦提高阶级觉悟，真正认识到与地主斗争的必要性和斗争胜利的可能性。第四，工作求透不求快。最后，陈云郑重指出：“发动群众同前方打仗同样重要”，并号召要保证把发动群众这一仗打好。^[8] 同年7月28日，陈云在南满分局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土改的中心要放在使占人口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雇贫农彻底翻身上，并要团结中农，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9] 这些讲话对在辽东收复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到1948年1月，除秋冬攻势的新收复区外，辽东大体上分了土地，安东、辽南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地区分了土地。辽东土改成绩是基本的，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发动了农民。

三、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和陈云都表现出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的革命精神

在这方面，邓小平集中表现在千里跃进大别山，陈云集中表现在主动请缨

去南满。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解放区受挫的情况下,转为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两解放区。从3月11日起,国民党军队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3月18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动撤出延安,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粉碎蒋介石企图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的阴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由战略防御提前转入战略进攻,指示邓小平和刘伯承准备突破黄河防线,出击中原,调动陕北和山东两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回援,并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6月30日晚,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邓小平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共13个旅12万余人,在冀鲁豫军区第一旅、第二旅接应下,从山东阳谷以东张秋镇至菏泽以北临濮集间150公里的8个地段上强渡黄河天险,突破国民党的黄河防御线,转入外线作战。

为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7月1日至2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发起鲁西南战役。此役历时28天,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4个整编师师部共5.6万余人,^[10]有力地配合西北和山东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为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通路。

7月23日,鲁西南战役尚未结束,邓小平和刘伯承收到中共中央电报,要他们“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

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11]。7月29日,邓小平又接到中共中央军委电报,说“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12],希望他们尽快挺进大别山。邓小平和刘伯承意识到,挺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关系战略全局和党中央在陕北的安危,困难再大也要克服。于是他们当机立断,决心提前结束休整。8月7日晚,他们率领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陇海铁路,向大别山挺进。8月2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历经20天连续急行军千余里,冲破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先敌进入大别山区,胜利完成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任务,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对于当年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困难情景,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至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

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13]

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表现了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的革命精神。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后来成为起义将领的郭汝瑰评价说：刘伯承、邓小平他们进军大别山呀，那是纵井救人，跳到深井里去救人，自己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他们敢干。他们一进军大别山，就把整个状况都改变了。国民党所有人马，大别山一部分，徐州分一部分，华北又分一部分，济南又分一部分，国民党的部队分散了。^[14]

跃进到大别山不易，在大别山站稳脚跟更难。进入大别山之初，部队处于无后方作战，面临重重困难。邓小平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励全体指战员树立起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1947年9月，他在第一纵队连以上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远离解放区，在敌占区还能没有困难？我们整天背着几十万敌军在这里转，弹药、粮食、被服得不到补充，战士们水土不服，很多人生病闹疟疾，伤病员得不到很好的治疗，群众基础、物资供应都远不如解放区，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困难是事实，但有

困难并不可怕。我们干革命就难免要同困难打交道，就要有克服困难的耐力。”“我们把敌人大量吸引过来，压力大了；我们远离后方，困难多了。但是，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其他战场上就轻松了，就可以腾出手来打胜仗了。”“我们背的敌人越多，我们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在各大战场上消灭敌人就越多，胜利也就越大。”^[15]

转战大别山是邓小平在抗战胜利后度过的最艰苦的一段岁月。尽管环境十分险峻，困难极其严重，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仍然从大局出发，勇挑重担。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的李雪峰回忆，邓小平曾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过一个电报，大意是：野战军主力丢掉重装备深入大别山牵制了国民党军一些主力，如能同意我们将再次于大别山区周旋月余，可使华野休整一个月，将来可配合东北野战军聚歼国民党主力于中原，我们决心吃更大的苦。这个请示电报中共中央没有批准，主要考虑到中野已损失很大，再拖下去可能拖垮。尽管如此，电报却反映出邓小平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的一贯精神。^[16]

陈云在解放战争时期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的革命精神集中表现在主动请缨去南满。1946年10月，国民党撕毁“停战令”，对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集中力量向中共南满根据地发起进攻，企图先吃掉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再全力北上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在北满的根据地，夺取整个东北。

10月19日,国民党军以8个师约10万兵力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进攻。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只有第三、第四两个纵队以及两个独立师,兵力不足4万人,敌我力量严重悬殊。到11月下旬,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南满根据地只剩下临江、长白、抚松、濛江四县,人口只有22万,形势异常严峻。在领导干部中,对于能否坚持南满对敌斗争出现了意见分歧。南满主力部队已做了在必要时跨过松花江,同北满部队会合的准备。

在这样的危急时刻,陈云挺身而出,主动请缨,要求到南满去。后来,陈云回忆说:“敌情严重,党内有意见(劲光反映),鉴于重大,自告奋勇。”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回忆说,当时南满处于国民党进攻的前线,形势严重,陈云同志自报奋勇去南满工作。10月28日,东北局会议决定派陈云去南满。陈云诚恳地说:南满是东北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需要增加人去帮助南满同志工作。但我在军事上完全是外行,因此去后作用不一定会很大,力求不增加他们的麻烦,多做一些事情。^[17]东北局决定成立南满分局,由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亦称南满军区)政委。这样,陈云受命于危难之际,奔赴南满,开始了具有全局意义的坚持南满根据地斗争的艰苦历程。

陈云奔赴南满,挑的是一副艰巨的重担。首先,他要面对军事经验缺乏的困难。陈云到南满后,感到自己的困难在于军事上缺乏经验。1946年12月20日,他在写给东北局领导人的信中说:

“发生争论时,我无从说话,必须弄清事实,弄清利害,才能下决心。本来懂得军事的人,有许多问题是常识问题,但对我来说,却非下大力去摸不可。这件事比在北满不知苦多少倍,尤其因为军事常常逼在眼前,非迅速决定不可,而且我不能不管。但勇气是有的,现在正鼓起勇气来补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所未上的课。”^[18]

其次,陈云在当时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做出坚持南满的决策难度是很大的。“坚持南满”还是“撤到北满”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关系到能否粉碎国民党对南满、北满采取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关系到能否巩固党在南满、北满的革命根据地,关系到解放整个东北的战局能否顺利发展。而对于是“坚持南满”还是“撤到北满”,南满干部和东北局的看法又不尽一致。因此在十分短促的时间内做出正确决策并能说服各方,对于缺乏军事斗争经验的陈云来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陈云采取他擅长的调查研究的方法,最终果断地作出了“坚持南满”的正确决策,并说服了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陈云晚年回忆说:“我当时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们不坚持南满,向北满撤,部队在过长白山时要损失几千人。撤到北满,敌人还要追过来,还要打仗,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会损失几千人。由于我们从南满撤了,敌人可以全力对付北满,那时北满也很可能保不住,部队只得继续往北撤,一直撤到苏联境内。但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总住在苏联,早晚有一天还要打过黑龙江,打到北

满，打到南满。在这些战斗中，以前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要损失几千人。而且，当初主力撤回北满后留下来的地方武装也会受到很大损失。”“相反，如果我们留下来坚持南满，部队可能损失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但只要守住南满，就不会失去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敌人大批部队，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去打北满。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撤离南满损失小。”^{〔19〕}陈云在关键时刻为坚持南满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做出坚持南满的决策难度很大，实现坚持南满的任务更不容易。为了坚持南满，从1946年12月17日到1947年4月3日，南满部队连续进行四保临江的战斗，北满部队配合南满部队进行三下江南的作战。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坚持了南满根据地，巩固了北满根据地，迫使国民党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东北民主联军则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些战斗中，陈云在方针指导、组织协调、后勤保障上作出极大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萧劲光后来回忆说：“事实证明，陈云同志领导南满根据地的斗争，所作出的决策和贡献是举足轻重的，因此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完全改变了态势，我军从被动转入主动，扩大和巩固了根据地。”^{〔20〕}陈云同志的正确领导，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参考文献：

〔1〕〔2〕〔3〕〔6〕〔10〕〔11〕〔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712，716，736，717—718，672，673，675.

〔4〕〔5〕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8，116.

〔7〕〔18〕陈云. 陈云文选：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7—348，327.

〔8〕陈云. 陈云文集：第1卷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02—603.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陈云年谱（修订本）：上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627.

〔13〕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9—340.

〔14〕〔15〕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传（1904—1974）：上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652，663—664.

〔16〕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四川省委. 邓小平画传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138.

〔17〕〔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陈云传：上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74，483—484.

〔20〕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陈云画传 [M].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88.

（责任编辑 付国英）